DOI: 10.13957/j.cnki.tcx.2020.05.018

《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考略

许亮^{1,2}, 张茂林², 吴隽²

- (1. 景德镇陶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西 景德镇 333403;
2. 景德镇陶瓷大学 古陶瓷研究中心, 江西 景德镇 333403)

摘要:《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是由民国时期两位文物研究大家郭葆昌和福开森通力合作, 投入巨资, 耗时数年编撰出版的第一部向西方系统介绍中国瓷器的中英文双注陶瓷文献。该书自 1931 年问世以来就备受国内外陶瓷学界推崇, 有“民国第一善本”之美誉。然而, 是何原因成就该书“民国第一善本”之美名, 学界尚未有专文论证过。本文拟从该书的出版动机、出版过程、传世影响等方面进行考述, 借以彰显此书“民国第一善本”美誉乃至实名归。

关键词: 郭葆昌; 名瓷图谱; 善本

中图分类号: K876.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2278(2020)05-0736-05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Noted Porcelains of Successive Dynasties with Comments and Illustrations by Hsiang Yuan-Pien

XU Liang^{1,2}, ZHANG Maolin², WU Jun²

- (1. School of Marxism, Jingdezhen Ceramic Institute, Jingdezhen 333403, Jiangxi, China;
2. Ancient Ceramics Research Center, Jingdezhen Ceramic Institute, Jingdezhen 333403, Jiangxi, China)

Abstract: The Noted Porcelains of Successive Dynasties with Comments and Illustrations by Hsiang Yuan-Pien offers a systematic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orcelains for westerners and is the first Chinese-and-English-note porcelain document compiled by Guo Baochang and Fu Kaisen, two great antique researcher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o collaborated and made a considerable investment of time and money in publishing the book. Since its publication, the book has been highly praised in porcelain society at home and abroad, earning the reputation - “the first rare book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However, no researches have been attempted to reveal the reasons behind.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was to prove that it deserves the reputation by analyzing the motivation of its publication, the publication process and its influence.

Key words: Guo Baochang; atlas of famous ceramic works; rare book

0 引言

《历代名瓷图谱》是一本奇书, 相传为明代著名收藏家、鉴赏家项元汴(字子京)的晚年力作, 明清鼎革之后, 此书一直下落不明, 直到 1908 年英国东方学家卜士礼编译的英文版《历代名瓷图谱》在西方世界出版后, 此书才又重见天日。卜士礼版的这本装帧考究、绘画精美, 中英文双语版的传奇瓷器图谱出版之后, 引起了西方陶瓷学界的巨大关注。1931 年 6 月, 在卜本基础上, 郭葆昌结合自己收藏的其他摹本, 在吴炳湘的资助

下, 自制纸张、自购印刷设备, 联合福开森、张允亮、张煜全、种恒续、鹿训世、张思珂、褚克明、邵循懋等人, 投入巨资、费时数年又重新校注出版了此书。此书出版后因纸张特制, 印刷精美, 开本宏大, 校注详实, 立即引起了更大的轰动, 后逐渐成为中外陶瓷文化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和公认的民国第一豪华出版物。目前, 此书的初始版本已成为稀缺善本, 因而近年来也日益成为古籍善本拍卖市场的宠儿, 最高拍卖价格已过 10 万元人民币大关(2011 年上海国际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 该书成交价为 106400

收稿日期: 2020-04-11。修订日期: 2020-06-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5CXW031)。

通信联系人: 许亮(1984-), 男, 硕士, 讲师。

Received date: 2020-04-11.

Revised date: 2020-06-08.

Correspondent author: XU Liang(1984-), Male, Master, Lecturer.

E-mail: 181536009@qq.com

元人民币)。长期以来,由于该书售价高昂,存世稀少,制作神秘,因而关于该书出版的真实情况一直不甚清晰。鉴于此,笔者拟通过对相关新史料的梳理,将此问题阐明,以期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1 出版动机

关于此书的出版动机,郭葆昌、福开森在共同撰写的序言部分看似已经交代地十分详细,诚如序言所言,他们校对此书的动机是认为项元汴本人只是“精于鉴赏而疏于考证,制造之事又非所习”的鉴赏家而已,书中错误本已较多,再加上流传后世的版本多为临摹之本,因而错误难免。因此,“今既知其误处,不为辨证,真谛何自而明”,所以才要从事校订,“凡项说之误者,条辨以明之,书中事务则附以简注。埏埴之方,亦择要诠释,譌讹夺之字,悉为堪补。各器釉色,列表证明”^[1]。

但是,笔者认为郭葆昌校订此书的真正目的绝不是仅仅对前人错误的更正这么简单,而是有更高的追求。古董店学徒出身的河北定兴人郭葆昌一生经历就如这《历代名瓷图谱》一样传奇。他为人机敏,深得袁世凯赏识,洪宪帝制酝酿初始即由总统府庶务司丞擢升为九江关监督,不久之后又因“究心瓷业有年,窑务亦甚熟悉”^[2]而又兼任景德镇窑务监督,负责御瓷的烧造任务,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任督陶官。郭葆昌在担任景德镇窑务监督期间极其勤勉,“君子制造瓷器之工作,如取土、练泥、烧坯、调油以及上油、绘画诸事,均一一详细调查,至与工人、画手同起居,是以洞悉彼等艺术之秘诀”^[3],其不但顺利完成了御瓷的烧造任务,而且对景德镇窑业的改良也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深得农商部的认可,“该监督此次调查报告甚为至为详尽,所陈第一办法就窑厂原有基地房屋收回重加组织立全国窑厂之模仿,一以仿古制造之精进,一以求普通用品之改良等语诚为整顿陶务之上策。”^[4]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郭葆昌的境界绝不仅仅是做一个惟命是从的一般督烧御瓷的官员那么简单,他其实是一个具有开拓与创新意识,一心想振兴民族瓷业的实干家。虽然他的很多主张如设立大规模新式工厂、试用新法造瓷,举行博览会推销国瓷等宏大计划皆因袁世凯去世不得不终止,但是其在景德镇督陶期间立下的改良中国瓷业的理想却一直萦绕心头。跟郭葆昌有师徒情谊的著名历史学

家傅振伦先生在郭葆昌逝世之后的悼念文章中曾深情地谈到:“先生治学谨严,切实认真,实事求是”、“研究瓷器之目的,在于改进国瓷。先生亦欲以此为生平事业。”^[5]因此,重新校对项氏瓷谱对郭葆昌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其实现夙愿的一次绝好机会。这一点,从其写给好友银行家钱新之的私人信件中也表露无疑。这封信写于1934年4月23日,信件的主要内容是向老朋友详述《校注项子京历代名瓷图谱》这本书出版的始末情况,为便于读者理解,现摘抄部分内容如下:

“新之仁兄阁下:日前晤谈为快。兹将校印项氏瓷谱始末,以及印刷拙著情形陈诸左右,即祈察阅。弟于瓷业,薄有所知,往者颇宝振兴瓷业之志,廿载以来,搜罗历代名瓷,参考各家著作,皆为贯彻此旨。民国三年,建议政府提倡瓷业,已而奉命榷浚关,监督景德镇瓷务。在镇实地考察,颇试其端,所拟远大计划,未及施行,项城即世弟亦去职,遂无人注意及此。荏苒十有余载,鄙愿终莫能偿。知交乃多以著作瓷书相勗,东海桂辛,敦促尤切,至谓若及时撰述,将成国家罪人,简陋如弟,何以克当?然念瓷业关系国产之中,知交期待之殷,弟虽不文,曷敢不勉?瓷器为我国发明,自晋以还,最为煊赫。‘支那瓷国’,久为世界所公认。而历来说瓷之作,皆为透澈。其初不过文人涉笔,偶述旧闻。然断璧零缣,时有珍语;后来乃作为篇章或哀然专著者。其中可取固多,误谬亦不少,大抵操觚之士,不晓埏埴之方,而纪述之事,又非陶人所能;于是鉴赏家逞臆妄谈,考据者附会穿凿,加之市肆俗说,以讹传讹,以致瑕瑜互见,迷惘后人;盖自晋有瓷资金千数百载,无一完善之书。真理蒙昧,实为憾事!弟学识虽浅,而寝馈已深,凡事必本之学理,证以实验,自揣所得,或者较有实际,发愤撰述,此其动机也。”^[6]

通过此封私人书信,我们得已窥见郭葆昌之所以花费如此多的心血来完成这部书的校订工作之真正动机。郭葆昌自视甚高,且深受有同样督陶经历的历史上最杰出督陶官唐英之影响。这一点可以从郭葆昌诸多处事细节上可以看出,如其穷尽史料对唐英的生平首次予以翔实的考订,编撰《唐俊公先生陶务纪年表》,效仿唐英烧制“觥斋”款自用瓷器等。郭葆昌是数百年来最能读懂唐英的人,唐英一生著述颇丰,郭葆昌亦是。只可惜在瓷业领域本想大展身手的他没有像唐英那样欣逢盛世开创出一番惊天伟业,而是随着短命洪宪

王朝的垮台，黯然离去，因而心中不免愤懑，“事之不成，天也，今无望矣”^[5]。郭葆昌逝世之后，友人在谈及其一生取得的成就时，也多将其与唐英相比，“盖自康熙而还，制瓷名家无虑十数，或以学识显，或以收藏传，其能兼此二者，而又遭时之适遇，富感情之兴起，自唐英俊公后，实惟先生一人而已”。^[7]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正是校订者郭葆昌不忘初心，矢志振兴瓷业的精神才是这本经典文献立意高远的真正原因，诚如此信结尾其向友人感叹所言：“弟非专事好古，实为启新。倘有达者，採择理董，施诸实用，国产庶几有扩张之日，此区区之职志也。”^[6]

2 出版过程

“出版作为人类文化积累与传播的重要途径，自诞生以来，就存在着出版物自身品质如何的问题。出版物的品质从理论上讲，要追求比其他商品更高的品质，因为出版物是商品但又高于商品，对其品质有着远高于商品的要求。”^[8]如前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出版人郭葆昌心中，《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一书绝非是这位大古董商讲究投资回报的商品。为了成就这部旷世经典，一方面，郭葆昌本人“躬自校对”^[5]、“对于印刷、描画诸事亦皆亲自董理”^[7]；另一方面，他还充分发挥自己在政、商、学等各界多年积累的人脉优势来为此书的顺利出版保驾护航。简而言之，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超豪华出版团队确保了此书的高品质。此书的参订、校对、印刷、英文翻译乃至书名题写皆是出自当时的一流名家之手。参订者福开森，不但是位杰出的教育家、收藏家，亦是一位成就卓越的文物专家，在其长达57年在华岁月中，一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著述颇丰，成就巨大。1929年，故宫博物院为提升学术研究水平，依据《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制定《专门委员会暂行条例》，成立了古物、文献、图书三个方向的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的人选是由故宫博物院院长亲自提名并致信邀请，被邀请者皆是学界耆宿，福开森与陈寅恪、傅斯年、郭葆昌等一同被邀请为第一批专门委员，且是唯一一名洋委员。1934年，福开森与郭葆昌、陈垣等12人又被故宫博物院新任院长马衡聘为特约专门委员，“直接参与故宫文物清理、鉴定及审查工作”^[9]，可见其当时在中国学术界所取得的崇高地位；校

对人之一张允亮，乃前清举人出生，近代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善本部主任，图书馆专门委员；印刷负责人褚克明，是留日学习印刷技术归国的高材生，当时已是一名业内闻名的制色技术高手，曾任财政部印刷局工务处处长^[10]；至于英文翻译工作，郭葆昌亦极其重视，在给友人钱新之的信件中专门提起，“既事专书，流传宜广，欲贡诸于欧美，乃不得不兼译西文。弟于外国之文，一字不识，最感困难”、“倩种君恒续创译英文，经张煜全兄加以修正，更由福开森君润色之，亦颇费斟酌”^[6]，创译者种恒续是何许人也，笔者尚未查到相关信息，而修正者张煜全则是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知名学者，再加上由中国通福开森博士润色，此书英文翻译不精炼优美想必也是难事；另外，此书的书名题写乃是举人出身的几朝元老许宝蘅，清末的很多诏令均出自其手，在当时亦是德高望重的社会名流。此外，还有鹿训世、张思珂、邵循懋等人参与出版工作，足可见此书的创作团队阵容之强大，也反映出郭葆昌知人善任的出色管理能力，从而使此书的品质有了充分的保证。

第二，巨额资金投入为此书出版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此书之所以装帧雅致，绘画精美，与其运用了特定的纸张和印刷技术有莫大的关系，诚如郭葆昌所言：“器物之学，非图莫名，瓷器釉色，所关尤重，无图则书不可作，有图不精，反资淆惑”^[6]，因此，为了达到理想的印刷效果，郭葆昌不仅请来了褚克明这样的印刷高手，而且“专门从德国进口了印刷机，还专门定做了铅字”^[11]，然后“鸠集匠人，精加训练”、“自办印刷”以弥补当时国内印刷术“未臻美善”之不足^[6]。除此之外，印刷所用颜料亦多取之国外，而印刷所用的解斋纸“亦于赣闽间定制，不知者或认为外国品”^[12]。纵观郭葆昌一生，除了精研瓷学以外，第二感兴趣之物非纸莫属，其认为“世间与人生最关要切之物，惟瓷与纸。二者，不可须臾离，且与人相始终：接生必用纸；儿落地灌清毒药必用瓷。送终以纸覆面，用冥钱，且瘞明器——咸食罐”^[5]。鉴于郭葆昌在造纸印刷等方面的独到研究，1924年11月，其被财政部委任为印刷局会办^[13]。因此，为了使这本经典陶瓷文献流芳后世，郭葆昌可谓不惜工本亲自督造此书的印刷用纸，“书之纸由郭君本其经验指授方法，就原产地江西铅山县与福建崇安县交界之分水关外选匠督造，其料为新发

嫩牙,纸帘按书页大小特制,系依南唐澄心堂造法,研花于上下端,并标明‘觶斋制’字样。纸质无论在何种气候中,皆能历数百年而不变,且研印若干次,而纸面愈见光泽,一无损伤,故于彩印最为相宜。”^[14]关于觶斋纸的珍贵程度,民国书画家巢章甫在文集中也有过精彩描述:“觶斋纸为瓷器收藏名家郭葆昌所定制,李明仲之营造法式。项子京氏之瓷谱,俱用此类纸所印。其佳处在沾湿无涨缩,故经年套板,亦不爽毫厘。觶斋乃以瓷器图案,制成暗纹。倩江西名工定制大批,用备印行自藏瓷谱之用”^[15]。因此,我们不难推测此书出版时的高昂代价。关于此书的具体花费,许宝衡日记中也有明确记载:“此册经历二年有馀始印成,靡款十八万元有奇”。18万元在20世纪30年代初是一笔巨款,据史料记载,此书出版的当年(1931年),上海一名成熟男性工人的日工资每天才5角左右^[16]。因此,此书的出版费用确实令人咂舌。为了出版此书,即使是古董生意经营有道的郭葆昌亦感到十分吃力。在给钱新之的信件中,谈及自己即将要印刷出版的《觶斋瓷乘》一书时,也不得不发出“近因经济关系,不得已暂为停工结束,拟另行改组,重事经营”之感叹。好在此书的出版得到了郭葆昌的好友—曾任北京警察厅厅长、安徽省省长,中兴公司经理的吴炳湘大力支持。郭葆昌在给钱新之信中也多次提起此事,“福开森君与吴君镜泽,闻弟此举,同深怂恿,皆愿合作”、“吴君镜泽,多方资助,不幸倏焉已逝,未观厥成,不胜伤感之至!”^[6]此书出版之后,在书中序言结尾处,郭葆昌又再一次隆重表达了对吴炳湘倾力赞助的感激之情,“始事之初,吴君炳湘赞助最力,倏焉已逝,吾人于此不胜思旧制感已。”^[1]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知,郭葆昌为此书的出版用心之深、开销之大、费时之长,也正因如此,才最终保证了此书的出版品质,为后世留下了这本经典之作。

3 出版之后的影响

《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出版后,在收藏界和学术界引起了轰动,诚如郭之好友王荫泰在其悼文中所言:“制版之精致,套色之调匀,全书既出,举世惊叹”^[7]。但是,由于此书印刷成本高,印刷数量少,所以售价高昂,远非一般消费者所能承受得起,因此能够拥有此书或者得以见此书

真容者都难能可贵。1935年8月,时任华北大学艺术专修科主任的王森然去参加好友李铎卿(著名医生兼收藏家)的私人宴会时才有幸得以一见,在其后撰写的《历代名瓷图谱》一文中,他生动地描绘了第一次见到该书时的心情:“余于饭后谈话,得悉近得‘历代名瓷图谱’一本,颇名贵。是民国二十年定兴郭葆昌校注,美人福开森参订,定名为‘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图谱印刷,备极富丽,共八十三图,定价美金三百圆,穷困如我,不至铎卿处,诚无录识其版本……郭氏以考古之能手,万贯之家资,造纸杭州,运机德国,筹备出版……余极爱之,因囊中常涩,无由一购以为憾也”。^[17]连一向为人谨慎,日记中“多记人来客往和自己的生生活,轻易不动感情,少发议论”^[18]的许宝衡在第一次见到此书时,也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得意地写到:“廿四日(1932年1月1日)……郭世五来,以所印《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见赠……购机制纸,教授工作,皆世五精心独选,可谓中国印刷开创者,外人颇重视之,恐国内尚少人知,每册售价叁佰元,余以题写封面,得享此厚馈。”^[12]

诚如许宝衡所言,此书在国内“尚少人知”,但是在海外却引发了广泛关注。由于此书的出版工作由郭葆昌和福开森两位中国古物研究的顶尖学者担纲,因此发行之后在西方世界引发了热议,从而进一步带动了西方学术界对这部中国著名古陶瓷文献的研究热潮。1933年,英国著名收藏家大维德在《东方陶瓷学会会刊》发表了相关质疑文章,认为此书中的瓷器插图与《宣和博古图》和《考古图》有部分雷同之处,因而怀疑此书并非完全是项元汴的手稿,后人可能做了补充^[19];1936年,鼎鼎大名的汉学家法国人伯希和又在西方著名汉学杂志《通报》上对该书发起了“词赘句长、长篇累牍的详细质询”^[20],伯希和完全否认此书的真实性,认为这份图谱很可能是成书于17世纪晚期的一部伪书^[21]。1944年,著名中外交通史家冯承钧将伯希和这篇文章全文翻译后介绍到了国内,并以《历代名瓷图谱真伪考》为名发表在民国时期重要学术刊物《中国学报》上,进而又引发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如著名历史学家邓之诚就对伯氏文章的诸多观点十分认同,因此认为此书是伪作无疑,“以予观之,必伪无疑,相传《项图》瓶类最多,称名不一。此仅寥寥二蒜头瓶,其他亦与流传宋元明瓷式不类,伯希和痛诋之,不为未见”^[22]。针对伯希和的质疑,福开森随后也撰文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但是“最终,

福开森通过这本图谱本身的美以及其中瓷器的美学价值来捍卫这本书，当然还有他和郭葆昌所写的注释和项元汴的评论”。^[11]

然而，尽管此书的真伪引发热议，但是抛开真伪问题不谈，此书无论是学术价值还是艺术价值都为时人所称道，连伯希和本人也在批判文章中不得不对此书的精美程度赞赏有加，“郭葆昌与福开森二君以为有将布瑟的研究发挥之必要，将原图着色，明白注释，并将译文改正。费了数年的辛劳，赖有郭君之赞助，一种华丽版本因而刊行，其纸张，其印刷，其图版皆足为郭君私人所办的印刷所解斋书社生色。我因与刊行人之友谊，获有此华丽刊物一份。”^[23]另外，随着《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一书在西方所引起的广泛争论，客观上也进一步带动了西方学术界对中国陶瓷文化的认识与研究，进而扩大了中国陶瓷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力。也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正达到了郭葆昌瓷业救国、扬瓷国之美名的初衷。

4 结 语

《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无论是从出版的立意，出版团队的水平、还是印刷装帧的精美程度都无愧于中国近代最经典陶瓷出版物。经典是不会褪色的，它只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更加地历久弥新。相信这本集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为一身的“民国第一善本”一直会激励着后辈瓷人更好地向世界传承和传播好优秀的中华陶瓷文化。

参考文献:

- [1] 郭葆昌. 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1, 6.
- [2] 财政、农商部呈拟请简派九江关监督郭葆昌兼任窑务监督以资整顿文并批令[N]. 政府公报, 1915-3-4(20).
- [3] 福开森. 悼解斋先生[J]. 中国公论, 1941, 5(1): 164. Ferguson. Public Opinion of China, 1941, 5(1): 164.
- [4] 农商部呈拟议维持景德镇陶务办法请示文并批令[N]. 益世报, 1915-11-3(7).
- [5] 傅振伦. 郭世五先生传[N]. 说文报, 1946-8-12(2).
- [6] 佚名. 瓷史与瓷业[J]. 人文, 1934, (5): 5. Nameless. Monthly magazine of humanity, 1934, (5): 5.
- [7] 王荫泰. 悼解斋先生[J]. 中国公论, 1941, 5(1): 163-164. WANG Y T.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1941, 5(1): 163-164.
- [8] 杨松超. 文质理念与出版品质[J]. 出版发行研究, 2018, (11): 66. YANG S C. Publishing Research. 2018, (11): 66.
- [9] 本书编委会. 故宫博物院早期院史 1925-1949 年[M].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16: 96-97.
- [10] 马贵斌, 张树栋. 中国印钞通史[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5: 127.
- [11] (美)聂婷著, 郑涛译. 福开森与中国艺术[M].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7: 217.
- [12] 许恪儒·许宝衡日记·第4册[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2010: 1368.
- [13] 财政部训令. 派郭葆昌为印刷局会办文[J]. 财政月刊, 1924, 132(11): 17.
- [14] 沈津著. 书海扬舲录[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95.
- [15] 巢章甫. 海天楼艺话[M].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9: 69.
- [16]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刘鸿生企业史料 1911-1931[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292.
- [17] 王森然. 历代名瓷图谱[J]. 北晨画刊, 1935, 13(5): 2. WANG S R. Pictorial of Beichen, 1935, 13(5): 2.
- [18] 黄恂. 舞文冷痴[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7: 244.
- [19] Percival David· Hsiang and his album [J].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933, 34(11): 22-47.
- [20] (美)罗覃. 两位中国艺术品收藏家的交汇——端方与福开森[M].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3: 137.
- [21] 21] PAUL PELLIIOT. Le pretendu album de porcelaines de Hiang Yuan-pien [J]. T'oungPao, 1936, (32): 15-58.
- [22] 邓之诚著, 邓瑞整理. 邓之诚文史札记·上[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2: 76-77.
- [23] 伯希和著, 冯承钧译. 历代名瓷图谱真伪考[J]. 中国学报, 1944, 2(2): 38. PELLIIOT. Feng C J. Journal of China, 1944, 2(2): 38.